



第一三七期

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

编者按：在近年来我国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吴晗同志和翦伯赞同志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体。以“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史学纲领。长期以来，他到处作报告、写文章，大肆宣扬他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由于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善于使用折衷主义的说法，所以他的言论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在史学界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批判吴晗同志反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思想的同时，我们把翦伯赞同志史学纲领中的若干主要观点也摘录于后，希望大家认真阅读研究，结合对吴晗同志的批判，积极地参加这场史学界的大论战，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历史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

历史研究，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诬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是贴标签，只能导致空洞、枯燥。认为“必须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

“有一个时期，在学校里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编者按：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历史，对大量的史实进行科学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个人看，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

“有人说，‘以论带史’的‘论’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特定的具体事实。……”

“‘以论带史’的提法……应该废除。”

“由于以论代史（编者按：他将‘以论带史’篡改改为‘以论代史’，然后嘲讽和诬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的作法），因而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历史教学或研究中，只是围绕看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般原理原则甚至文句转来转去。”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不能把经典著作中的言语，当作任何问题都可以通用的万应灵药。现在好象有一种倾向，觉得史学论文中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则它的理论性愈高。这样，史学家的全部工作就在于筛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于一再重复这些文句。”

“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历史研究。但这不是说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都要引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言语作为结论。”

《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光明日报》）

“个别教师简直就少讲或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他们随便摘录一些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来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在讲课中，不是空洞地讲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在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家主观的意图。”

“当然，有些教师，也引用一些材料，但他们不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独立的概括，更谈不到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问题。他们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解，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经典著作变成了历史科学的标签。”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我们在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中……但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枯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片沙漏。在有些讲课中，充满了‘矛盾’‘规律’等词汇，但矛盾没有对立面，因而谁和谁矛盾也闹不清楚。规律还是一般的规律，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何在，还是没有找到。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十年史学研究和教学中最突出的缺点。”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必须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

《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

挥舞“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破烂武器，宣扬研究历史要用“本本主义”，胡说反对“唯史料论”的结果，会使无产阶级“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

《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

“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解；……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到原则。”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打起“历史主义”黑旗，反对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

玩弄折衷主义手法，认为不能用阶级观点解释历史，否则，就会把历史看成“黑漆一团”，就是“虚无主义”

“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基本要求，但是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

“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

“在研究历史时，必须先学会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但不是用这种原则原理来套历史。……不是用原理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理原则。”

《有关史学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内蒙日报》）

“不重视史料，或企图不通过史料的分析来说明历史，是不对的。研究历史必须从实在的具体史实出发，不能从空话出发。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这句话是对的。”

“现在有个别教师对史料不够重视。……有些青年，也有轻视史料的情况，他们只满足于一般的理论原则，而不去钻研具体的史料资料。”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有一个时期，对书本知识重视不够，这是不对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

“人们总以为在科学的花园里，到处都摆着酒席在等待着自己，分给科学家的任务就只需要开张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就行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没有替我们预备这样多的绝对科学的烤火鸡，他们并没有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的，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他们只是告诉我们寻找答案的方法。而人们往往对于自己碰到的任何问题，都要找一句经典著作来保释，好像任何具体的历史的答案都已经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库中，只需要一伸手之劳，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这种懒汉的思想，必须批判。”

“一直到现在，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过，不敢据史料的重要性，怕这样提会犯错误。我以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敢放炮是打不中敌人的。”

“有些个别的同志，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一起反对，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无异说，只有资产阶级才重视史料，才根据史料研究历史，无产阶级反而不重视史料，不根据具体的史实研究历史。资产阶级是言必有据，无信不征，无产阶级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既无史料又无论据是统一不起来的，零与零统一还不如等于零。”

《历史学上的阶级关系》（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华东师大所作报告的记录，未发表）

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贯彻党的政策，诬蔑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把今天的政策、口号塞进历史中去，蓄意歪曲政策和理论的关系

“所谓贯彻政策……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到古代史中去。然而有一个时期，有些个别的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主要地是塞到封建社会史中去。好像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已经推行过和提出过。”

“怎么能把我们今天认为应做的要强逼古人去做，把我们今天认为不能做的事禁止古人去做呢。”

“显然，用这样古今不同的方法来贯彻政策是违反历史主义的。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是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改造封建社会的政策，是把古代史上没有的可能的有的事情硬塞到古代史中去。”

“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一个运动。”

“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都拉到现在，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

“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它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具体地说，理论是可以通行古今中外的；政策则只管本国，只管今天。因此正象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政策推行于外国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今天的政策推行于古代。”

“政策和理论的另一区别是，理论是带有原则性的，它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政策则是具体性的，它的任务是规定在一定时期之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有着自己的政策，他们的政策都规定了当时应做和不应做，该做和不应做的东西。”

“政策和理论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政策要更多的照顾当前的具体情况。有些问题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正确的理论在什么时候发表最为适宜，就要受政策的指导。”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分析。”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研究历史必须站稳立场，也要不忘历史主义，仅仅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忘记历史主义，不算马克思主义。”

《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六日《新报日报》）

“必须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看到历史上的光明面，也要看到历史上的黑暗面。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光明时代，总有黑暗；反之，任何黑暗时代，也不能没有一线光明。不能因为进行爱国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盲目歌颂，美化阶级社会；也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有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古代史，也是非历史主义的。”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如果连一线光明也没有，历史就停止了发展。如果历史的中国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而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根据什么东西建立起来呢？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盘古所作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吗？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认为不能反革命就骂，见封建就反；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是骂不得的，在崩溃时期也是骂不得的

“同样的剥削制度，封建制度比奴隶制度总要好些，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

“继续提出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有人反革命就骂，见封建就反，好象立场站稳。但要知道，有时候是骂不得，反不得的哩！”

《历史学上的阶级关系》

“历史主义是重要的。然而有些史学家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该反对封建，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

否认农民的革命性，污蔑农民的革命战争

认为农民革命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皇权主义

“关于农民战争，他探讨了三个问题：一、农民是否把皇权作为自己的主要反对？二、农民是否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反对？三、农民是否反对封建作为一个制度反对？”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不同意中国古代的农民没有皇权主义，或者在……外族入侵时才有皇权主义的说法。他认为皇权主义思想不是因为外族的外来而发生的伤风咳嗽，而是先天地主的不治之症。……只要封建地主所有制还存在，就有这种思想存在，这种思想是阶级支配的法则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他指出，皇权主义与反对皇帝和皇朝是两件事，反对皇帝不等于反对皇权主义。皇权主义是一种肯定皇帝制度的思想，是皇帝制度的华。农民推翻了皇帝，却并没有也不打算推翻皇帝制度，因此不能因为农民要推翻旧的皇朝和皇帝，便认为他们没有皇权主义。”

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说，农民和地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事实的存在是一件事实，认识这种存在的事实又是一件事实。分散的个体经济把农民分别隶属于各个地区和个别的地主，使他们彼此隔绝，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也无法理解剥削他们的主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阶级，也就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说，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劳动者也不能认识压迫他们的是哪一种制度。当时工人捣毁的还是机器而不是制度，难道农民就能看出压迫他们的是哪一种制度？如果农民能够看出压迫他们的是封建制度，那么他们就会反对作为这种制度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说，农民并不反对私有制。……中国的农民也曾经提出过贫富的主张，但……他们只是要求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

《翦伯赞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在有些讨论农民战争的文章中，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还要进步。他们在马克思阐明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前，已经清楚地知道地主是一个阶级并知道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在马克思指出封建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个剥削制度以前，已经清楚地知道封建是一种制度，并且知道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在恩格斯和斯大林提出皇权主义的问题以前，已经清楚地知道不把皇帝当作个人，而是当作皇权主义来反对。甚至认为农民可以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非封建制的政权。显然这些同志是以自己认识的事情，古人也能认识。实际上，今天小学生能够认识的问题，古代的圣人也未能认识。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农民战争问题，难道不是历史主义吗？”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它是一个进步的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我们要揭露和反对封建制和地主阶级的本质，但对于这个制度的上升时期和崩溃时期，要有区别，对于这个阶级初出现在历史时期的时期和他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也要有区别。而且就是在他走向崩溃的时期，也不应一口气骂到底，因为在任何黑暗时期总有一线光明，否则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现在有些讲稿简单地把自己的历史写成了罪恶的堆积，写成了一堆垃圾。”

《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认为历史上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强调要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要写革命，也要写反革命”

“在阶级社会，基本矛盾永远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也是这样。它有时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时是民族间的矛盾。不要把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所谓矛盾转化，不是从阶级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如果历史上各时代的主要矛盾都是阶级矛盾，那就等于否定了矛盾转化的可能性。”

《历史教学中怎样认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人民教育》一九六二年一月号，此文由翦伯赞同志的秘书张传贤同志代笔）

“不要把阶级矛盾简单化，要着重地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要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关于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能只写一面。例如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如果只有一面就不能构成矛盾。因此，当我们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时，要着重写革命也要写反革命。”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文汇报》）

“也是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狗咬狗，值不得一理。不仅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象讲了反革命的，或者讲了革命的一面的缺点，就会失去立场。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又只讲革命的一面，讲革命的方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又只讲革命的一面，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简单了，简单到任何方面也没有了。”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能用‘狗咬狗’三个大字一笔抹杀。如果这样，那就把充满了矛盾的阶级社会简单化了。”

《关于打破王朝循环论》（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它们都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当时历史的主要内容的一个方面，怎么能不讲呢？不但七国之乱、八王之乱要讲，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倾轧、宫廷政变也要讲。”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强调必须大写农民、农民战争和农民领袖的缺点

“农民虽然就是这个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但由于他们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形式相联结，而且由于他们是小私有者，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上就产生一连串的弱点：小生产和小私有，使他们眼光狭隘，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远大的理想，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自私，偏狭，散漫。”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九五一年二月《学习》第三卷第十期）

“在写农民战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私有者。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不要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要夸大农民战争的积极性和觉悟性。”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应该肯定，但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是有缺点的。”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农民军的缺点不可以写呢？……不但可以写而且应该写。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不应该以热烈的感情歌颂农民战争，还要以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科学态度全面地深入地分析农民战争，指出他们的优点，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从分析中接受教训。农民战争没有缺点呢？……如果不是有意把农民革命现代化，把农民战争说得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那末，农民战争是有缺点的，而且就是现代无产阶级也不是毫无缺点，为什么古代的农民就没有缺点呢？如果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小私有者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研究农民战争，我想我们是能够看得见农民的缺点的。”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认为农民革命只能建立封建政权，农民战争不起什么作用

“农民能够并且曾经建立过政权，这是事实，问题在于这种政权是什么性质。……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农民可以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农民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不能是其他的什么性质的政权。有人说农民的政权与地主的政权有区别，他是小农的政权，但小农的政权仍然是封建的政权。”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虽然是被压迫的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是革命斗争，但是不论农民战争的次数，怎样频繁和规模怎样广大，甚至把封建统治的王朝废了一个又建立一个，然而始终没有根本摧毁封建的经济制度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状态。”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战争总是失败的。”

《中国古史的农民战争》

（转第六版）

